

# 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思想

朱 謨

壹、前言  
貳、文化的民族主義思想  
參、倫理的民族主義思想  
肆、政治的民族主義思想  
伍、經濟的民族主義思想  
陸、濟世的民族主義思想  
柒、結語  
註釋

## 壹、前 言

十九世中葉以後，列強放肆地向亞洲侵略，中國成爲蠶食鯨吞瓜分的對象，「辱國喪師，堂堂華夏，不達於鄰邦」，中華民族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說出：「如果不想辦法恢復民族主義，中國將來不但要亡國，或者要亡種。所以我們要救中國，便先要想一個完善的方法恢復民族主義」（註一）。以民族主義爲中心的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於焉開始。

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思想，一如其自述，「余所持之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註二）。所以其精義簡要地說，可分爲三點：第一是救中國的民族主義，恢復中國固有道德、發揚固有智能、喚醒民族精神；主張中國民族自求解放，解脫列強侵略的枷鎖，以達

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二是救世界的民族主義，抑制強權、扶助弱小、濟弱扶傾，以聯合世界平等互待的民族，共同奮鬥；主張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三是自由、平等、博愛與和平的民族主義，達到國家圖發達，種族圖生存，世界圖大同的目的。

十八世紀是人類命運的轉捩點。偉大的思想家，開創了一頁人類歷史光輝燦爛的紀錄。「啓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不但對近代民主政治發生催化作用，是近代民主政治的酵母，而且也是民族主義復興的推動者。啓蒙時期三位思想家：英儒鮑令布魯克(Henry St. John, Viscount Bolingbroke 1678-1751)、法儒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和德儒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充分表達十八世紀啓蒙時代，歐洲思想家在絕對君主政體，帝國擴張侵略潮流中，蘊育著一股人道主義的暖流思潮，對全人類的幸福抱著動人的慈悲心腸，對於其他民族的權利具有尊重的心理，對於侵略主義與不容異教的觀念，則是充分地憤慨與反抗。啓蒙運動中四項觀念是理性、自然律、進步和自然權利；對於制度的省思態度，考量其是否合理，是否適合自然律，是否增進人類的進步，是否保障個人的權利；最終思考是否人類得到直接利益。這樣的思想體系，應用在當時社會環境之中，對於民族主義的思潮，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使世界民族主義思想再次復興，茁壯成長。海斯(Carlton J. H. Hayes)評述鮑令布魯克：「他不但視民族主義為增加民族合法利益最自然合理的工具，而且也視之為達到最崇高國際主義，獲得最佳的人道主義結果時，最自然合理的工具」(註三)。海斯肯定：「各民族政府的根本工作是增進民族利益，而不是增進朝代或階級的利益」，「真正的民族利益需要一種和平的外交政策，與一種對其他民族主權與利益的合理尊重」(註四)。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和共同意志說(General Will)，對於民主政治有舉世無敵，獨一無二的功效，對於民族主義思想的發揚，同樣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民族是以個人為組成元素的人類社會群體，個人在社會群體中，受社會契約論及共同意志說的尊重，人是生而自由平等，具有天賦人權的基本權利；同理，以個人組成的民族體與民族體之間也應該自由、平等、獨立，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倘若違反這項原理，就像民主政治一樣，可以群起革命，追求民主自決，所以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遂成為十八世紀學生思

想，凡是違背自由、平等、獨立的行爲，都應該起來反抗，予以譴責、消滅。

德儒赫德則從文化的角度來詮釋民族主義，根據其見解，民族是人類種族最自然的分野。兩群人類起初因地理與氣候上的特質而分別起來，後來各有其特殊的歷史傳統，各有其適當的語言、文學、教育、文化。赫德排斥任何民族限制或阻礙另一民族的自然發展，認爲一個政府剝削或降低一個民族的文化，乃是不合理的專橫主義、最惡劣的表現。海斯曾引述赫德的話：「最自然的國家是一個具有一種民族性格的民族。：：與政府的目的絕對相反的莫如國家不自然的擴充、莫如各種各類民族在一個權力下的混合。」（註五），也就是民族自決，聽任民族由於自然力來發展。

所以孫中山先生說：「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自然力便是王道」，易言之，用自然力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反過來說，民族是自然力造成的，民族應該任由自然力去發展，其他民族不要強加干預壓制。

孫中山先生自述「生於晚世，目不得睹堯舜之風，先王之化。心傷韃虜苛殘，生民憔悴，遂甘赴湯蹈火，不讓當仁。糾合英雄，建旗倡義，擬驅除殘賊，再造中華，以復三代之規，而步泰西之法。使萬姓超躋，庶物昌運，此則應天順人之作也」（註六）。

孫中山先生自述其革命思想基礎謂：「我們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這個正統道德思想承襲儒家思想，匯聚在民族主義思想中，除了文化的民族主義思想以外，還有倫理的、經濟的、政治的、濟世的民族主義思想。

## 貳、文化的民族主義思想

孫中山先生對於民族思想，認爲「實吾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鑠者也」。所以說明其所持之民族主義，

「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而且「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註七）。

孫中山先生對於中國清末之「被輕於異族」，「不齒於鄰邦」，「強鄰環列」，「瓜分豆剖」，認為是失去民族主義的原故。所以爲了挽救中國，主張恢復民族主義。

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對中國而言，孫中山先生提出喚醒民衆，「皆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要恢復民族主義，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現在中國是多難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時代，那末已經失去的民族主義，才可以圖恢復」（註八）。

此外，孫中山先生發現中國的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是發揚民族主義的有力單位，「把各姓的宗族團體，先聯合起來，更由家族團體，結合成一個民族的大團體」。

恢復民族主義，抵抗外國侵略的方法，孫中山先生提出兩種方法：「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制，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致滅亡」（註九）。

而「振起民族精神」與「恢復民族地位」，就是民族主義的具體目標。孫中山先生明白揭示：「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註一〇）。

進一步又指出：「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孫中山先生所持之民族主義，其文化的民族主義思想，可以分恢復固有道德、恢復固有智能兩方面。

## 一、恢復固有道德

在恢復固有道德方面，「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對於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首先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並且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詳細闡述，讀者宜參閱民族主義第六講原文，本文不予引錄。

孫中山先生提倡恢復中國固有道德，其首在發揚中國傳統美德，首重忠孝；忠於國家，忠於民族，然後發生大力量，才能救國救種，避免亡國滅種的危險。特別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潮東漸，中國洋務自強，維新變法，一如孫中山先生所述：「現在受外來的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爲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可見，孫中山先生崇古而不泥古，摩洋而不迷洋。因此，提出「要忠於國，要忠於民」，「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兩字講到極點，國家才自然可以強盛。」「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 一、恢復固有智能

在恢復固有智能方面，「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識也應該喚醒他。」孫中山先生把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列爲中國固有的智識，「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所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孫中山先生不諱言地批評中國人修身不檢點，因此提出「所以今天講到修身，諸位新青年便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而且強調要恢復中國人固有的修身，「不知道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緻的智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緻的智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做起，把中國固有智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民族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此外，「民族主義」第六講中，曾細述中國固有智能，一方面說明「因爲後來失去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

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一方面說明中國固有的能力，恢復中國人的信心。「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恢復起來」，才能恢復中國固有的地位。

恢復固有道德與恢復固有智能，總而言之，就是恢復中國固有文化。文化由民族所創造，由歷史所累積；而民族亦由文化而凝聚。復興文化便是復興民族。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國民革命，第一個目標就是復興民族，而復興民族的方法則是復興文化：恢復固有道德，恢復固有智能。

### 三、迎頭趕上

復興中國固有文化是發揚、推行民族主義的方法，是消極的方法，要用宣傳及教育的手段來達成目的。積極的方法，則是把中國固有文化融合西洋新文化，創造出一股隨時代進步的新文化。所以「民族主義」第六講中，強調要「迎頭趕上」學習西洋科技文化，並且在民權主義中，採納西方的民主政治與三權分立制度以外，把中國固有的考試、監察制度融合而創立五權憲法。在民生主義中，糾正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弊病，提出平均地權與節制私人資本及發達國家資本，創造融合中西的新文化。

錢穆氏評謂：「近代中國，惟 國父孫中山先生，始是高瞻遠矚，斟酌盡善。一面主張驅除韃虜，排滿革命，但自中華民國創建，便容五族共和，漢滿蒙回藏一家，在其所揭舉的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喪然首列，然卻以香港碼頭工人在其竹槓中藏有頭獎彩票為喻，依然進一步在求大同太平，祇是退一步先求保種救國。然其民族觀與文化觀之本末輕重之間，仍不失傳統文化之精神」（註一一）。

### 四、善用宣傳與教育

革命事業要喚醒民衆。民族主義要恢復固有智能，以堅固國人信心；恢復固有道德，以振奮人心。所以要用宣傳為手段。

孫中山先生說：「我們用已往的歷史證明起來，世界上的文明進步，多半是由於宣傳，譬如中國的文化，自何而來呢？完全是由於宣傳。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遊列國，是做什麼事呢？是注重當時

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他刪詩書，作春秋，是爲什麼事呢？是注重後世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所以傳播到全國，以至於現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國的舊文化，能夠和歐美的新文化，並駕齊驅的原因，都是由於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傳工作。」（註一二）因此，進一步說明「先知先覺的人要他們知，便應該去教，教便是宣傳。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久而久之，便可傳到四萬萬。如果四萬萬人都明白了我們的主義，他便歡迎我們去建設中華民國。」（註一三）

孫中山先生在宣傳三民主義方面，借用報紙作爲傳播媒體之利器。如其所述：「余於乙未舉事廣州，不幸而敗，後數年，始命陳少白創中國報於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以後，革命宣傳驟盛，東京則有戡元成、沈虬齋、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主張革命。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爲書，尤爲一時傳誦。同時國內外出版物爲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丕變。及同盟會成立，命胡漢民、汪精衛、陳天華等撰述民報。：：民報成立，一方爲同盟會之喉舌，以宣傳主義；一方則力闢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之謬說。使革命主義，如日中天。」（註一四）由此可見宣傳對於革命的重要性和其貢獻。

至於教育國民，孫中山先生喻之謂：「須知救國即是救破舟一樣，當舟沈之時，不圖共力而補救，徒顧個人舖蓋行李，俄而舟已沈矣，生命亦已具亡，又有有於舖蓋行李？吾國人之思想何莫不然？各自營其私，無顧大局之觀念，卒之自身亦不能保」（註一五）。

而且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提出恢復民族主義的兩種方法：合群與能知。說明：「大家先知道了這個方法的更要去推廣，宣傳到全國的四萬萬人，令人人都要知道；到了人人都知道了，那末我們從前失去的民族精神，便可以恢復起來。從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著覺；現在要恢復民族精神，就要喚醒起來；醒了以後，才可以恢復民族主義」。這段講演的內容，就說明了「宣傳」和「教育」兩種方法，是恢復民族精神的辦法。在孫中山先生所持文化的民族主義思想中，佔居極重要的地位。

## 參、倫理的民族主義思想

孫中山先生曾說：「民族思想，是出於天性」。「天性」是與生俱來的「性」，經過教育文化的薰陶感化而為「人性」。民族主義的目標就是要發展由「天性」感化而為的「人性」。「人性」的中心思想是「仁」，形之於外，是為「愛」。因此，「仁愛」為民族主義的中心思想。孫中山先生之愛國家，愛民族，而發展出民族主義，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濟弱扶傾」，「繼絕世」，「興滅國」，以達「世界大同」。「以建大同」就是孫中山先生對於民族主義仁愛思想之具體主張。

民族是以個人為組成元素的人類社會群體。個人是民族的組成元素，然後循家庭、家族、氏族、姓族、宗族、部族、種族等擴而大之，而成人類社會。

易經咸卦「序卦」有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這是說明人類社會之起源，而且倫理隨人類以俱來。人之生活仰賴家庭與社會，其關係密切，接觸頻繁，而有其準則，成為倫理。」

孟子公孫丑篇有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從家庭倫理到宗族倫理，而至於國家倫理。

蔣中正先生曾著「三民主義的本質」一文，說明「倫理是民族主義的本質」。換言之，民族主義的本質是倫理。

本文討論倫理的民族主義思想，可分倫理的意義、倫理的內容、以及倫理的民族主義思想敘述討論。

### 一、倫理的意義

倫理的意義，在中國古書典籍中，不勝枚舉。例如：禮記云：「擬人必其倫」。疏云：「倫理也。明親疏之輩分，是為倫」。荀子云：「倫類以為理」，注云：「人倫者，人事者」。中庸云：「行同倫」。疏云：

「倫，道理也」。

蔣中正先生在「三民主義的本質」一文中解說：「倫理照中國文的本義說，『倫』就是類，『理』就是紋理，引申爲一切有條貫，有脈絡可尋的條理，是說明人對人的關係。這中間包括分子對群體的關係，分子對分子間相互的關係，亦即個人對於家族、鄰里、社會國家和世界人類應該怎麼樣闡明各種關係上正當的態度，訴之於人之理性而定出行爲的標準、倫理與法制不同，就是倫理是從人類上啓發人的自覺的。」又說：「凡是人類，必有他與生俱來的天性。愛父母，愛家庭，以及對於自身關係的同族同國人的相愛相卹，推而至於愛人類，實在都是天性。」（註一六）

因此，倫理的意義，就是人生行爲規範，人類合乎行爲規範之適當行爲，來追求最高最美之實現，以及人格之完成，所以倫理當於人類生命本身求之。倫理啓發人類以行爲合於社會至真、至善、至美的標準。

民族主義的標是保種救國，是拯救民族的危機。民族危機的產生是倫理遭到破壞。這種破壞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失去其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侵略，破壞國際民族倫理。所以，民族主義者強調恢復固有倫理，實踐固有倫理。

倫理是人與人相處之道，是人群與人群相處之道。所以蔣中正先生說：「民族主義是以倫理爲本質的」。民族主義就是講求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人群與人群間的正常關係。所謂正常關係就是自由、平等、獨立與博愛。

「夫婦人倫之始」，人類社會以家庭爲基礎，家庭生活有其規範，謂之家庭倫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順。擴而張之，社會亦有其倫理，敬長、慈幼、救孤、恤貧、重公德、守信義、互助合作、推己及人，以造成和諧安樂之社會。

一個民族之綿延久遠，必有其獨特的民族精神，其民族精神則以其民族倫理爲核心。民族倫理是民族精神的靈魂，失去民族倫理，必失去民族精神；失去民族精神，必產生民族危機！因此之故，中國之民族精神，仰

賴中國之民族倫理。中國民族倫理之復興，中國民族精神隨之發揚，民族復興預期可待。蔣中正先生在「反共抗俄基本論」一文中，曾說：「我們的民族主義，就是要建立一個完全基於倫理的國族，以便民族繁榮，民族獨立和民族自由。：：所以我們今日如要召回我們民族的靈魂，提振我們的民族精神，恢復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就要以倫理爲出發點，來啓發一般國民的父子之親，兄弟之愛，推而至鄰里鄉土之情，和民族國家之愛，以提醒國民對國、對家、對人、對己的責任。」

如此，便是說明民族倫理可以發揚民族精神。而且民族倫理不但恢復民族精神，復興民族地位；假如遵守民族倫理，進而能夠以愛本民族之心，去愛其他民族，而發揚「繼絕世、興滅國」，「濟弱扶傾」，「以進大同」的精神。

## 一一、倫理的內容

簡單地說，倫理是人的行爲規範。所以倫理以「人」爲中心。亦以「人」爲起點。大學云：「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中庸亦云：「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便是以個人之修身爲倫理的起始。

大學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天下平。但是修身之道：「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所以，格物、致知、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爲中國民族固有倫理、固有政治哲學。格、致、誠、修是內聖之功；齊、治、平則是外王之道。內聖而王道是爲聖人，「聖人，人倫之至也」。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倫理發皇至極，民族精神發揚，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世界各民族亦必一律平等。

中國歷史悠久，若言倫理推溯自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經唐虞，降三代，聖君賢相宏揚光大，中國民族倫理已見基礎。

孫中山先生自述其革命哲學基礎是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至孔子，相繼不絕的正統思想。中國倫理便是起自堯舜，歷經夏商周三代之充實改進，至孔子而集大成。

孔子是儒家思想之代表。中國倫理思想亦以儒家思想爲骨幹。

孔子以智、仁、勇三達德爲做人的標準。「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而智、仁、勇三達德之心精神就是「誠」，是修身的前提。

儒家思想以「仁」爲中心，孟子盡心篇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具備，「仁」人也。然而蘊於內者之謂「仁」，發於外則謂「愛」。「仁愛」推至極點，便是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進而言之，「仁愛」的起點，則爲孝悌。孝悌不限於對父母盡孝，兄弟弟恭而已。孝經中云：「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都爲不孝」。如此看來，孝悌涵蓋修身、事君、爲政、交友，作戰的道理，和前述修、齊、治、平相類近，也是人倫之道。

倘若兼備孝悌與仁愛，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諧，人群與人群之間關係自然也能夠和平自由，是民族主義之極則。

中國倫理思想既以儒家思想爲中心，並非謂排斥其他諸家。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達富國強兵，孔子曾謂：「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相當讚美管子的貢獻，便是一証。道家的自律精神，墨家的兼愛精神，法家的法治精神與儒家的仁愛、王道精神，互輔相成，益彰中國民族倫理之優越。講究中國固有倫理，必能發揚中國民族精神，而重振中國民族悠久歷史，所以，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演講中，特別強調恢復中國固有道德和中國固有政治哲學。前者是「四維」「八德」，後者是「修、齊、治、平」的倫理思想。

### 二、孫中山先生的倫理思想

孫中山先生很重視中國的固有道德，中國有很好的固有道德，才能夠在世界上屹立數千年，沒有被滅亡。所以孫中山先生以恢復中國民族固有道德作爲恢復中國民族精神的起點。他說：「因爲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

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註一七）又說：「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孫中山先生在解說中國民族固有道德時，詳細解釋「八德」內容。對於忠孝二字的解說，是「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究的孝字，幾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註一八）

孫中山先生既不泥古，亦不是一位中國沙文主義者，所以在三民主義思想體系中，固然蘊育有濃厚的中國固有思想，但是並不排斥西洋好的思想，不但是不排斥，而且還兼而治之，這就是孫中山先生偉大的地方。孫中山先生說：「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但是在說到「仁愛」二字時，孫中山先生同樣讚美外國人的實踐精神，「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如此說法，還是符合孫中山先生自述：「如果是好的，當然要保存」那一句話。不過外國有好的，也要學習。所以，才會說：「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我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美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

孫中山先生因襲我國固有之思想，而與民族主義相關者，至少有下列三點。

（一）仁愛 孫中山先生墨寶中，常有以「博愛」二字相贈與其同志。革命先進邵元沖氏著述「孫文主義總論」一文，其中說明「博愛」的意義有三種，一、為愛人而奮鬥，二、為愛民族文化而奮鬥，三、為愛民族而革命。「博愛」就是中國固有倫理思想中的「仁民愛物」，也就是「仁愛」思想的實踐。孫中山先生把自己視為社會之一份子，愛已如愛人，所以為愛人而奮鬥；而且更尊崇中國文化，講究王道精神，所以一方面要發

揚王道精神，一方面要用中國文化來恢復中國民族精神，進而恢復中國民族地位。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就是以此爲其基礎。

(二)修齊治平之理 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詳細解說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平天下」，「把一個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爲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甚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保存的。」但是，孫中山先生坦率地指出中國人在修身方面的缺失，使得外國看中國人爲野蠻，被人輕視。「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功夫做得很有條理，誠中形外，雖至舉動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國人，不以鄙陋行爲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國人一定很尊重的。所以今天講到修身，諸位新青年便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只要先能夠修身，便可以來講齊家、治國。：：我們現在要能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智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註十九）修身是中國固有智識的起點，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民族自由、平等、獨立之境界才能達成。

(三)禮運大同篇 孫中山先生也常書寫「天下爲公」四字贈與其同志，互勉革命之最高目標。「天下爲公」四字出自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大同篇中云：「男有分，女有歸」，就是「夫婦人倫之始也」，而且「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講信修睦」，則人類社會能夠「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這些倫理思想，由內而外，由中國而世界。孫中山先生的倫理民族主義意識，不僅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以建民國，以進大同」，不僅僅是中國民族達到大同之境，世界民族也達到大同之境。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也是救世界的主義。不過，救世界要從救中國立足。所以，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提倡中國的民族主義，而反對在中國提倡世界主義；世界主義是中國民族強盛以後，才進一步提倡世界主義。但是讀者也不必懷疑，既然反對在中國提倡世界主義，爲甚麼中國民族強盛以

後，又要提倡世界主義呢？這個疑問，根據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可以從兩方面來說明。

第一、孫中山先生在演講「民族主義」第三講時，曾經說過一個燴炙人口的故事，香港輪船碼頭一個苦力，把彩票放在竹槓之中，一旦彩票中獎，高興過度，把手中的竹槓投入海中，竹槓沒有了，彩票也沒有了。這個故事比喻彩票是世界主義，竹槓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沒有了，世界主義也成了泡影。

中國民族是一個受外國侵略，衰弱的民族，就如同香港輪船碼頭的苦力一樣，要先有竹槓謀生，保住竹槓，才能中彩票，成爲富強；如果拋棄竹槓，富強就無望了。所以，孫中山先生把「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也提倡世界主義，以爲民族主義不合世界潮流」，視同丟掉竹槓，而且「把竹槓丟得太早了，不知發財的彩票，還藏在裡面」。因此主張「再找得一枝竹槓」，恢復民族主義，這就是孫中山先生對中國民族在受列強帝國侵略時，反對率先提倡世界主義的道理。

第二、孫中山先生認爲中國民族強盛以後，可以提倡世界主義，但是他的世界主義不是帝國主義，而是濟世的民族主義。

孫中山先生因此提出說明：「我們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用公理打破強權。強權打破以後，世界上沒有野心家，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可以講世界主義。」這就是他提倡先實行民族主義，進一步，才推展到世界主義的道理。

## 肆、政治的民族主義思想

「民族主義」第二講之演講詞中，已經指出中國民族遭受自然力的壓迫、經濟力的壓迫、政治力的壓迫；而且政治力的壓迫，對於中國民族的亡國滅種危險性最大。

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以民族革命爲先著，但是以政治革命同時並進，不但用政治革命加速民族革命的成效，亦用政治革命保固民族革命的成果。孫中山先生曾說：「將來民族革命實行以後，現在的惡劣政治，

固然可以一掃而盡，卻是還有那惡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試想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他的政治卻不過依然同漢、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後，復外人侵入，這由政體不好的原故。不是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然後經營，至於著手的時候，卻是同民族革命並行。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註二〇）

如同孫中山先生所說：「種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註二一）。反之，政治不平等，種族也不能平等，所以，孫中山先生主張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同時並進。「異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結果惟革命；同族間政治不平等，其結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歸於平等」（註二二）。

政治革命的根本是要行民權主義，「民權主義，即人人平等，因為一族，絕不能以少數人壓迫多數人。人人有天賦之人權，不能以君主而奴隸臣民也」（註二三）。同理，列強也不能壓迫中國人，以少數人壓迫多數人。雖然孫中山先生說：「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有其道理，但是，同樣也可以衍伸，民權主義也有對外打不平的功用。國內民主平等，並且提倡天賦人權的平等思想，列強就沒有理由壓迫中國民族。

### 一、政治的壓迫

「民生主義」第四講演講詞中指出：「外國用政治力來壓迫中國，是些甚麼方法呢？從前中國滿清政府和外國戰爭，中國失敗之後，外國便強迫中國，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外國至今都是用那些條約來束縛中國。中國因為受了那些條約的束縛，所以無論甚麼事，都是失敗。中國和外國如果在政治上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在經濟一方面可以自由去和外國競爭的，中國還可以支持，或不至於失敗。但是外國一用到政治力，要拿政治力量來做經濟力量的後盾，中國便沒有方法可以抵抗，可以競爭」（註二四）。

又說：「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本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槍砲，他們用槍砲來，我們還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祇要一張紙和一枝筆。用一張紙和一枝筆亡了中國，我們便不知道抵抗。：：祇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如果英、法、美、日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國家的情形講，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的」（註二五）。

爲了解脫列強帝國主義的政治力的壓迫，在民族主義方面是要喚醒民衆，但是徒然喚醒，不作改革，於事無益，所以孫中山先生主張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同時並進。

### 一一、消極的政策

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基本目的就是救國保種；在政治方面，消極的政策是推翻滿清專制，建立民國，廢除不平等條約；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人人自由平等；國際各民族一律平等，自由獨立。

雖然，「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國外列強奮鬥的，民權主義是用來對國內強權奮鬥的」，「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好像內政與外交壁壘分明，各不相涉。事實上，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內政是外交的支柱。內政不清明，專制腐敗昏庸，而導致列強帝國主義侵略，造成中國民族亡國滅種的危機，就是明証。所以，孫中山先生在政治方面，主張內外兼顧。推翻滿清，建立民國，而且善用外交，爭取平等自由獨立。

孫中山先生明白指出：「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甚麼是『民權制度』呢？民權制度就是要推翻君主專制，實行民主政治，提倡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平等，一方面告訴人民，人人都要做皇帝，一方面又要避免爭做皇帝。」所以說：「我們革命於宣傳之始，便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家，就是想免了爭皇帝之戰爭」，但是「所以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成立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如此說法，簡單地說，就是由中國人大家自己來做皇帝，而不是由一個人做皇帝。換言之，就是實行民權主義，施行民主共和制度。

至於對外政策，孫中山先生主張「凡一國外交，當首審己國利害所存，以決政策。」（註二六）「外交形

勢，仍完全視我國自動之能力如何以爲斷，我不自助，人亦無從助我也。」（註二七）「凡論一國之事，當各就其利害之端不可移易者，以爲基礎，而各爲之想像其所取之策，孰爲最宜。因之可以決己國之趨避，決不能徒訴諸感情。」（註二八）

所以，國民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平等獨立的地位。但是，辛亥起義，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以後，反而沒有立刻要求列強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宣布「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家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去之，與我友邦益增睦誼，持平和平主義，將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循序以進，不爲倖獲。對外方鍼，實在於是。」（註二九）一方面是「將以尊重外交之信義，維持均勢之現狀，以專力於內治也」（註三〇）；一方面爭取國際友誼，爭取各國承認，見重於國際，然後逐漸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目的。是一種和平漸進的政策，而不是魯莽激進，不顧國際信義的革命手段。

### 二、積極的主張

積極的主張就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獨創的民權主義，建立全民政治的民主共和國。其內容就是實行權能區分，五權分立，均權制度、地方自治。以達到全民政治。孫中山先生自述：「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爲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爲民主專制，必不可行。」而且不但是實行全民政治，並且要建立萬能政府，建設一個五權憲法的政府。

孫中山先生說：「我們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所主張的民權，是和歐美的民權不同。我們拿歐美以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後塵，是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註三一）

又說：「我們現在主張民權來改造民國，將來造成的新民國，一定是要澈底，要造成徹底的新民國。」這種「駕乎歐美之上」的「新民國」，就是實行五權憲法。實行五權憲法以後，政治民主化；內政清明，

則外交順利，達成民族平等革命的目的。孫中山先生曾謂：「內政不清，外交益多荆棘，有謂外交運用得宜，則內政可，除圖改善者，此實未窺外患之來，由於內隙耳。」（註三二）又說：「夫欲外交之勝利，必先謀內政之修明。」（註三三）堪稱睿智卓見。

後來，革命先進胡漢民氏著述「三民主義連環性」一文（註三四），闡述三民主義的優越性，說明「三民主義是從民族出發的，不是從個人出發的。」三民主義連環性的基點，就在起首即以民族為單位。民族主義，固然不必說是以民族為單位的，就是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也是要以民族為單位的。「三民主義，就是樹立在以民族為單位的生存問題的基點上。以民族為單位，所以才講民族主義，中國要四萬萬的人民都有自己管自己的權，同時世界各民族的人民都要有自己管理自己的權。」

胡氏引述孫中山先生的話：「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治，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不能有，焉能治，不能治，焉能享？」然後，胡氏說出三民主義連環性的要義是在於：（一）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二）實行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三）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所謂「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就是本段所討論之政治性的民族主義思想和後段討論的經濟的民族主義思想。」

## 伍、經濟的民族主義思想

孫中山先生因滿清專制統治及列強侵凌中國，奮起革命，所以民族革命是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的原動力。

「民族主義」第二講中，說明中國民族遭受三種壓迫：一是自然力的壓迫，就是列強人口增加，而中國民族人口不增多，「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併吞中

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並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二是政治力的壓迫，就是列強用政治手段，簽訂條約，瓜分中國，列強只要在談判桌子上，一夕之間，一紙外交條約，就可以把中國瓜分掉。三是經濟力的壓迫。「民族主義」第二講演講中說明：「經濟力的壓迫，比較帝國主義——就是政治力的壓迫還要利害。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看得見的，好比此次列強用二十多兵船來示威，廣州人民便立時覺得痛癢，大家生出公憤，就是全國人民也起公憤。故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覺得有痛癢的。但是經濟力的壓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感覺，像中國已經受過了列強幾十年經濟力的壓迫，大家至今還不大覺得痛癢，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列強的殖民地。」甚至「應該要叫做次殖民地。」

中國民族所遭受的三大壓迫，其中以經濟力的壓迫最為嚴重，國民革命目標是在圖國家之發達，種族之生存，所以在民族主義中，經濟的民族主義思想僅次於文化的民族主義，要喚醒民衆，知道中國民族遭受這種經濟力的壓迫，無聲無嗅，不覺得痛癢的侵略之嚴重性；而且不但要消極地解脫這種經濟力的壓迫，更要積極地建設經濟，成爲富強的中國。

本文分經濟力的壓迫，消極的政策、積極的主張三項敘述說明。

### 一、經濟力的壓迫

清末中國民族所受經濟力的壓迫，孫中山先生說明：「統共算起來：其一、洋貨之侵入，每年奪我利權的五百萬萬元。其二、銀行之紙票侵我市場，與匯兌之折扣，存款之轉借等事，奪我利權者，或至一萬萬元。其三、出入口貨物運費之增加，奪我利權者約數千萬至一萬萬元，其四租界與割地之賦稅、地租、地價三椿，奪我利權者總在四五萬萬元。其五、特權營業一萬萬元。其六、投機事業及其他種種之剝奪者，當在數千萬元。這六項之經濟壓迫，令我們所受的損失，如果無法挽救，以後只有年年加多，斷沒有自然減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經濟之壓迫，至於國亡種滅而後已。」（註三五）

分析上列六項經濟力的壓迫，產生的因素不同。其一是受到外國人的侵略，例如海關；落人外國人的手

中，失去自主權，因爲不平等條約，海關由外國人管理，不但不能用提高關稅來保護本國產品，反而還要抽押金，加重本國貨物的稅，來保護外國貨物。其二是中國人的心理，對於本國的東西沒有信心，「一般人民都情願收藏外國紙幣，不情願收藏中國現銀」，「中國人有了錢，要存到銀行內，：：只要聽到說是外國人辦的，有了洋招牌，便喫了定心丸，覺得極安全，有錢便送進去，就是利息極少，也很滿意。」其三是本國的貨物品質不如外國貨；服務業類的銀行及船運等，都不如外國，所以就被外國壟斷了。尤其經濟力的壓迫配合上政治力的壓迫，用外交條約取得租界與割地。經濟力的壓迫如虎添翼，更加厲害。

### 一一、消極的政策

國民革命的宗旨，對內要「覆被政府，還我主權」，對外要解脫列強不平等條約桎梏，「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在政策上，對內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爲指導原則；對外則敦親睦鄰，維持世界和平，進而達到獨立、平等。同盟會軍政府宣言中之對外宣言便揭告：「(一)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二)償款外債照舊擔認，仍由各自洋關如數攤還；(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四)保護外國居留軍政府佔領之域內人民財產；(五)所有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各國權利，及與各國所借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宣言之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國民軍政府者，概以敵視；(七)外人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爲戰爭用之物品者，一概搜獲沒收。」

民國元年，臨時大總統布告友邦書，說明「吾中華民國全体，今布此和平善意之宣言書於世界，更深望吾國得列入公法所認國家團體之內，不徒享有種種之利益與特權，亦且與各國交互提挈，勉進世界文明于無窮。蓋當世最高最大之任務，實無過於此也。」所以宣告「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爲有效，至於條約期滿而止；其締結于革命起事以後者，則否。」（註三六）

對外政策則用敦親睦鄰邦誼，是一種策略，一方面遵守國際公法原則，新政府繼承舊政府所簽訂之國際外交條約，廣結邦誼，如「告友邦書」之中說明：「俾吾中華民國得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誼，故不恤捐棄生命，以與是惡政府戰，而別建一良好以代之。猶恐世界各邦或昧於吾民睦鄰之真旨，故將下列各條，披瀝陳於各邦

之前。」以昭大信，贏取友誼，而達到自動廢除不平等條約。

同理，孫中山先生提出錢幣革命之見，「非常之策」有二，第一行錢幣革命，以解決財政之困難。用紙票以替代金銀為交換中介。第二謀不敗之戰略，以抗強鄰，而保領土。

孫中山先生提出主張：「共和成立之後，當將中國內第全行開放，對於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國興辦實業；但於海關稅則則須有自行管理之權柄，蓋此乃所以保其本國實業之發達，當於中國之利益為本位。」又說：「但欲保其獨立及領土完全而已，倘此二者被侵，彼並無須籌備，但以最近拒用外貨辦法，僅暫時犧牲其商務及經濟利益，列強無論何國早望風而靡矣！」（註三七）

### 三、積極的主張

孫中山先生曾說：「今中華由專制而創共和，國既成立，而貧弱至此，何以能富強。我中華之弱，由於民貧。余觀列強致富之原，在於實業。今共和初成，與實業實為救貧之藥劑，為當今莫要之政策。」（註三八）所以，孫中山先生著力在發展實業，以達成富國強國目標，而說：「中國乃極貧之國，非振興實業不能救貧。」

孫中山先生最具高瞻遠矚之見，提出「國際共同建設中國實業計劃」，主張「與世界各國互相提攜，共同開發。」孫中山先生在「計劃」中說明：「欲使此計畫奉行順利，余以為必分三步以進：第一、投資之各政府，務須共同行動，統一政策，組成一國際團；用其戰爭時任組織管理等人材，及各種熟練之技師，令其設計有統系，用物有準度，以免浪費，以便作工。第二、必須設法得中國人之信仰，使其熱心匡助此舉。如使上述兩層已經辦到，則第三步，即為與中國政府開正式會議，以議此計畫之最後契約。而此種契約，：：以其為於兩方最得宜，而於向來中國與外國所結契約中，為人民所最歡迎者也。」（註三九）

並且提出「評議國家經營事業開發計畫之先，有四原則必當注意：（一）必選最有利之途，以吸收外資；（二）必應國民之所最需要；（三）必期抵抗之至少；（四）必擇地位之適宜。」（註四〇）

利用外資開發中國實業，以濟中國資金之短絀，中國「天然財源極富，如能相當開發，則可成爲世界中無

盡藏之市場」，「此政策果能實現，則大而世界，小而中國，無不受其利益。」「如是則關於中國問題之世界禍根可以永遠消滅，而世界人類生活之需要，亦可得一絕大之供給源流。」（註四一）

「實業計畫」十大綱領，六大計畫，主要重心是交通之建設，商港之開闢，鐵路之建築，礦冶、農業之開發，及移民邊陲等。其中尤其以商港之開闢及交通之建設最關重要，是中國建設之根源基礎。

孫中山先生大聲疾呼建設交通：「中國人民之衆，幅員之大，而文明與生計均不及歐美者，鐵路不興，其一大原因也。」（註四二）「特今日中國既貧且弱，曷克臻此，故欲能自立於地球上，莫如富強之道，莫如擴張實行交通政策。世人皆知農工商礦爲富國之要圖，不知無交通機關以運輸之，則著之皆失敗。」（註四三）開發農礦林牧，然後配合鐵路、公路、港口運輸，便能行生利，而厚生。民富國強之目標達成，救國保種的民族主義目的也水到渠成地達成了。

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思想，不是狹隘、偏激、保守、拘泥的民族主義，他具有利己利他，博愛濟世的情操，所以他提出來的主張，消極方面是解除中國處於亡國滅種的境地，積極方面則是國家圖發達，種族圖生存的主張，而且中國之建設與世界和平相連，要以開發中國，建設中國之成果貢獻於世界，供國際共享。最後還要「濟弱扶傾」政策，幫助世界弱小民族，不但使他們不受欺侮，而且解脫厄運。孫中山先生著述之「國際共同開發中國實業計畫」一書，是其經濟的民族主義思想之代表作。

「國際共同開發中國實業計畫」一書，原由英文著寫，後譯爲中文，簡稱「實業計畫」，著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其立意是大戰結束後，戰爭期間的人員及軍器廠房設備投閒置散，既浪費，又發生失業問題，所以主張用大戰時期兵工廠設備改裝爲民用機器生產，兵工場技術人員移爲民用，尤其幫助中國開發實業，最爲有利。蓋中國資金短絀，技術人員缺乏，機器設備不足，但是中國天然財富充足，倘能予以有效開發，不特中國獲益，世界獲利。這真是一件利己利他的偉大計畫。

孫中山先生在英文本「實業計畫」序文中說：「世界大戰宣告停止之日，余即從事於研究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而次第成此六計畫。余之所以如是其亟亟者，蓋欲傾竭綿薄，利用此絕無僅有之機會以謀世界永久和

平之實現也。夫以中國幅員之廣，：：益以埋藏地下無量數礦產與夫廣大雄厚之各種農產，乃不能雄飛獨立，與世界各國互相提攜，共同開發；而反以謾藏誨盜，致成列強政治經濟侵略之俎上肉，斯誠不獨中國之恥，抑亦世界各國之憂。」

孫中山先生極其睿智坦陳：「今後中國問題，其嚴重殆十倍於巴爾幹，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危機一日不能消除；且其戰區之擴大及戰鬥之猛烈，尤非第一次所可比擬。」確如孫中山先生所預見，中國問題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焦點，戰區之廣大，戰鬥之慘烈，都比第一次爲甚，最後投射原子彈，幾乎毀滅人類世界。所以孫中山先生在序文中指出：「顧欲解決此問題，其道果安在乎？余以爲舍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外，殆無他策。此政策果能實現，則大而世界，小而中國，無不受其利益。」

中文本「實業計畫」之序文中，坦言著述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其宗旨，「蓋欲利用戰時宏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而成我國民一突飛之進步；且以助各國戰後工人問題之解決。無如各國人民久苦戰爭，朝聞和議，夕則懈怠，立欲復戰前原狀，不獨戰地兵員陸續解散，而後鐵路工廠亦同時休息。：：我固失一速進之良機，而彼則竟陷於經濟之恐慌，至今未已。：：將來各國欲恢復其戰前經濟之原狀，尤非發展中國之利害而已也。」

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思想中，非常強調自主性，所以在經濟方面，主張借用外資，引用外國技術人員工程師，但是「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應由中華民國國家所雇專用練達之外人，任經營監督之責。而其條件，必以教授訓練中國之佐役，俾能將來繼承其之，爲受雇於中國之外人必盡義務之一。」（註四四）

## 陸、濟世的民族主義思想

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民族主義具有兩項基本思想，其一、是中國境內各民族自求解放，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其二、是國際各民族自求解放，國際各民族一律平等。

國內各民族自求解放，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其方法已如前述各節敘述，其要點，簡而言之，恢復中國固有文化、固有道德、固有倫理，進而恢復中國民族固有精神，恢復中國民族固有地位。

孫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義，在說明三民主義之意義時，最簡捷的一句話：「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三民主義以民族主義為立足點，也可以說：三民主義是以民族主義為起點，也是以民族主義為終點。因為三民主義的最終目標是救國保種，和民族主義的最終目標相同。致於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的關係，則是互為方法，互為目的。

但是，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民族主義不只限於中國的「救國保種」式的狹隘民族主義。而只是以救中國和保中國民族為起點，其至高無上的目標，是促進世界各民族解放，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是以救世界，保世界各民族為目標，有「繼絕世，興滅國」的世界觀，所以，濟世的民族主義思想是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民族主義中，基本思想的第二項。

這種救中國、救世界的民族主義思想，散見在孫中山先生著述之中。依照三民主義連環性之說，民族主義是以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為手段、為方法。所以在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及相關著述演講中，都能廣泛地體認到孫中山先生具有高瞻遠矚的濟世思想。可以分民族方面的濟世思想，政治方面的濟世思想和經濟方面的濟世思想三項敘述介紹。而三項濟世思想萬流歸宗於民族主義之中，成為救中國、救世界的民族主義。

### 一、民族方面的濟世思想

孫中山先生民族方面的濟世思想，主要可以從「民族主義」第六講和「大亞洲主義」兩篇演講詞，窺知其梗概。

「民族主義」第六講演詞中說明：「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麼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甚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的時候，想到今日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

這個觀念和前述竹槓與彩票的故事一樣，主張「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才「能夠治國、平天下。」換言之，先有民族主義，才配講世界主義，而且世界主義不是列強的帝國主義，是扶傾濟弱的世界主義。

「民族主義」第三演講詞中，指出：「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們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義，要全世界服從。」在第四講演詞中，繼續進一步批評：「至於歐洲人所講的世界主義，其實就是有強權、無公理的主義。」又說：「其實他們所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反之，孫中山先生以民族主義為基礎，推而廣之，再講世界主義，而且「對外的責任要反抗帝國侵略主義，將世界受帝國主義所壓迫的人民聯合一致，共同動作，互相扶助，將世界受壓迫的人民都來解放。」（註四五）

民國元年四月一日對參議院發表臨時大總統解職辭中，特別說明：「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凡中華民國國民，均有國民之天職。何謂天職？即是促進世界的和平。此促進世界的和平，即是中華民國前進之目的。：

現在世界上立國百有數十，雄強相處，難保不有戰爭發現。惟中國數千年來，即知和平爲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種思想，故數千年來之中國，純向和平以進行。中華民國有此民數，有此民智，何難登世界舞台之上與各國交際，共謀世界之和平。此種和平運動，即是中華民國國民之天職。」（註四六）

孫中山先生曾說：「我五大種族皆愛和平、重人道，若能擴充其自由、平等、博愛之主義於世界人類，則大同盛軌，豈難致乎？」（註四七）

如此說明，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民族主義，是以中國民族愛好和平天性爲基礎，講求扶弱濟傾的世界主義，不但不會變相成爲帝國主義，而且幫助世界各民族自求解放，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

民國十三年，在日本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成長，是濟世的民族主義之實踐的起步。把中國民族主義理想推展於亞洲，然後再進而實現於世界，所以，孫中山先生對於日本民族的期望，特別殷切。「大亞洲主義」演講詞中，表達得最爲透澈。

首先說明：「我們亞洲從前有哲學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倫理的文化，和工業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是亙古以來，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種種文化，都是由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到了近幾百年以來，我們亞洲各民族才漸漸萎靡，亞洲各國才漸漸衰弱，歐洲各民族才漸漸發揚，歐洲各國才漸漸強盛起來。到了歐洲各民族發揚，和各國家強盛以後，他們的勢力更漸漸侵入東洋，把我們亞洲各民族和各國家，不是一個一個的消滅，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註四八）

歐洲列強一百多年來，對亞洲民族的欺壓，激起了亞洲的民族主義。首先是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那一天，就是我們全亞洲民族復興的一天。」後來，日本戰勝俄國，埃及獨立，土耳其獨立，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獨立，也成了事實，「這種進步的思想發達到了極點，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才可以聯絡起來，然後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

孫中山先生剖析東西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專用武力的文化來壓迫亞洲民族，而東方文化是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人的文化，要人懷德的文化，也就是王道的文化。所以，孫中山先生說明中國從前強

盛的時候，對於四鄰弱小民族和弱小國家，都是「用王道感化他們，他們是懷中國的德，甘心情願，自己來朝貢。」到了中國衰弱，歐洲國家強盛起來，就用武力來壓迫亞洲民族。孫中山先生確信「反乎正意人道的行爲，終究是要失敗的」，「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明。」

最後，說明大亞洲主義，「就是爲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爲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受壓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亞洲專有的，就是在歐洲境內，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國家，不只是壓迫外洲同外國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國之內，也是一樣壓迫的，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爲基礎，是爲打不平；：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衆和平解放的文化。」

孫中山先生心重語長地期望日本能夠認識他所提倡的民族主義是濟世的民族主義。要求日本國民慎擇「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因爲「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孫中山先生坦白地指出，「亞細亞之和平，亞細亞人應有保持之義務；然中國現在則缺乏維持之實力，故日本之責任，非常重大。余希望日本力圖中國之保育，而與中國互相提攜也。」（註四九）又說：「亞細亞爲吾人之一家，日本與中國則一家之兄弟也。假如此雙生之兄弟，有相闕之事，則亞細亞之一家，絕不能保持其平和。」

提倡大亞洲主義，不是要稱霸亞洲，或者囊括獨佔亞洲利益。本文作者曾在本學報第十三期發表「國父大亞洲主義的區域民族主義意識觀中，已經比較美國的美洲門羅主義、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和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明辨三項主義之差異及優劣。然而孫中山先生大力提倡大亞洲主義，是要以中日兩國合作爲基礎，締造和平、自由的亞洲，進而產生一個和平的世界。所以，孫中山先生說：「日本爲亞細亞最強之國，中國爲東方最大之國，使此兩國，能互爲提攜，則不獨東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維持，蓋無可疑者也。」反

之，「亞細亞爲吾人之一家，日本與中國則一家之兄弟也。假如此雙生之兄弟，有相閱之事，則亞細亞之一家，絕不能保持其平和。」

孫中山先生胸懷濟世大志，希望以中國的王道文化，感化亞洲近鄰民族爲起點，和日本聯合成亞洲民族主義的潮流，抵抗西方霸道文化的侵略。亞洲和平，進而世界和平，人類免於侵略戰爭之不幸。所以，大亞洲主義不是大中國主義，也不是大亞洲主義，而是主張世界上被壓迫弱小的民族聯合起來的世界主義。

戴傳賢氏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文中說：「我們看先生的全部著作已經可以明白，先生是以『世界大同，人群進化』爲最終結目的的愛國者。」又說：「先生的思想是愛中國人，先生的信仰也是愛中國人，先生的力量也是由愛中國而生。把這一個愛中國的心，推廣起來。就是愛全亞洲的被壓迫民族，愛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推到極處，就是愛一切人類。由愛中國人的心，生出救中國行爲，就是要把中國人從被壓迫的痛苦中救出來。」（註五〇）所以，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具有濃厚濟世的思想，胡漢民氏曾謂：「民族主義做了三民主義的先鋒，同時又和民權民生兩主義，互相紐結連鎖，而形成一個整個的主義，永遠足夠應付世界上各民衆的需要。」並且進一步說出：「世界主義便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才是世界主義的實行。」（註五一）

邵元冲氏所著「孫文主義總論」中，結論性地指出：「我們要知道孫文主義並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也不是單純的國家主義。他是一方謀中國民族的獨立自由，一方謀完成世界大同工作的偉大主義。他對中國及世界之前途，負有莫大之使命。」邵氏進一步分析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可以分出三個階段：一、致力國民革命，二、完成三民主義之實際工作，三、趨向世界大同。

### 一一、政治方面的濟世思想

孫中山先生提倡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爲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爲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而後可以圖治。」民權主義正是以保障民族主義之成果能夠維持永久，用民主政治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的理念，引申到民族主義中，建立世界各民權一律平等的理念。「民權主義」第三講演講詞中，闡述眞平等的精義，而

且說明世界人類之天賦，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要調和三種之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爲目的，而不以奪取爲目的。」而且「此三種人互相爲用，協力進行，則人類之文明進步，必能一日千里。」這項服務和互用的觀念，倘若應用在國際之間，世界上有的民族強盛，有的民族衰弱，就如同個人之天賦智慧的聖賢愚劣，世界各民族如果能夠調和使之平等，不以奪取爲目的，而以服務援助互用爲目的，則世界太平，沒有強凌弱，衆暴寡的事實了。

孫中山先生比較中西文明，坦白指出歐美國家的物質文明，一日千里，進步很快，但是政治哲學方面的進步，不及物質文明進步；反之，中國的政治哲學還有可以保存的長處，「所以中國今日要實行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歐美，便要重新想出一個方法」來。而且說明：「如果不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我們要中國進步，民族的前途沒有危險，自己來實行民權，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種辦法。」（註五二）

因此，孫中山先生發明五權憲法，其主要內容是權能區分、五權分立、地方自治和均權制度，設計一個萬能政府。五權憲法是孫中山先生綜合中西政治思想與制度，融會貫通而發明的萬能政府規範，能夠防止西方國家政治已經產生的弊端，創造一個萬能政府。倘若中國實行成功，就像美國獨立革命以後，制定世界第一部分成文憲法，作爲世界各國的榜樣。

五權憲法的主要特色有兩項：第一是五權分立，是擷取西方憲政制度中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加入中國固有政治制度中的考試權和監察權，綜合而成，但是由三權分立的精神，改變爲「五權分治」，不再是「分立」「制衡」，而是「分工」「合作」了。

「民權主義」第六講之講詞中指出：「中國從前實行君權、考試權和監察權的分立，有了幾千年；外國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過外國近來實行這三種權分立，還是不大完全，中國從前實行那種三權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神，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立

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了一個很好的完璧，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像這樣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國家有了這樣的純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但是，國人似乎很少能夠了解孫中山先生設計五權憲法的真意，常常把五權憲法中五項治權之一的立法權，視同西方國家國會行使的立法權。因此，中國憲政制度迄今常生爭議齟齬。其實，孫中山先生已經把外國的三權分立改變為權能區分的「二權分立」與「五權分治」。因為「五權分治」沿用舊名詞「五權分立」，因而使世人常誤用外國的「三權分立」觀點解釋。

第二項特色，就是「二權分立」。孫中山先生把政治大權分為「政權」與「治權」兩種。「政權」是「權」，由人民或人民代表掌握，用來管理政府，控制政府，就如同外國國會行使的立法權；「治權」是「能」，分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部門，由政府用來管理衆人之事，為人民服務。如此「權」「能」兩相「區分」，「政權」與「治權」分立，成為五權憲法中「權能區分」的特色，就如同三權憲法中的「三權分立」一樣。

孫中山先生獨創的五權憲法，確如其自述是因襲我國固有之思想，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而獨見創獲者。不過，上述對於五權憲法兩項特色，則為作者研究五權憲法與西方國家憲法原理，所獨見闡述者。坊間著作，尚少有如此解釋，可稱是作者研究五權憲法之新見。

「民權主義」第六講演講詞中指出：「有了這種政權和治權，才可以達到美國學者的目的，造成萬能政府，為人民謀幸福。中國能夠實行這種政權和治權，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因為美國獨立革命，制定第一部成文憲法，法國大革命，成文憲法傳到歐洲，日本明治維新，成文憲法又傳到亞洲，三權分立的成文憲法成為世界民主憲政標本，孫中山先生現在發明五權憲法，期望同美國憲法一樣，成為世界民主憲政的新樣本。

### 三、經濟方面的濟世思想

孫中山先生首先在民生主義裡，建立「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學說。人類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是追求民生

之富足，人類進化歷史就是社會進化的歷史；社會進化的歷史就是民生進化的歷史，所以「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換言之，民生是歷史進化的重心。

解決人類社會的民生問題，人類求生存的問題，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一講演講詞中，便指出：「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

爲了要求大多數有利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孫中山先生主張互助，並提出說明：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以互助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互助之用也。就是用道德仁義之美德，達到社會互助。社會之能互助，社會才能和諧，才能進步，社會大多數才有利益，孫中山先生所以反對馬克思共產主義，反對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註五三）

在「民生主義」裡提出的主張，是「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因此，提出節制私人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二種辦法。而且中國患窮，開發實業，需要龐大資金，所以主張借用外國資金。孫中山先生說：「照美國發達資本的門徑，第一是鐵路，第二是工業，第三是礦產。要發達這三種大實業，照我們中國的資本學問和經驗，都是做不來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的資本。我們要外國已成的資本，來造成中國將來的共產世界，能夠這樣做才是事半功倍。：：：所以要不能不借助外資，來發展交通運輸事業；又不能不借用外國有學問經驗的人材，來經營這些實業。：：：所以要趕快開採礦產，也應該借用外資。其他建造輪船，發展航業，和建設種種工業的大規模工廠，都是非借助外國資本不可。」這種借用外國資

金有兩大原則，第一是最適合於中國實業之開發；第二是大多數有利益的互益計畫。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孫中山先生提出「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畫」草案，鼓勵歐戰各國，將大戰期間製造軍器之工廠及人員，轉移至中國，幫助中國開發實業，既重於投資之工廠閒置，亦免於人員失業，造成社會問題。所以說：「此政策果能實現，則大而世界，小而中國，無不受其利益。余理想中之結果，至少可以打破現在之所謂列強勢力範圍，可以消滅現在國際商業戰爭與資本競爭，最後且可以消除今後最大問題之勞資階級鬥爭，如是則關於中國問題之世界禍根可以永遠消滅，而世界人類生活之需要亦可得一絕大之供給資源。」

「實業計畫」方案，既幫助中國開發實業，使「如能有相當開發，則可成爲世界中無盡藏之市場。」又幫助歐洲國家在大戰結束以後，建立復原計畫，而不致發生經濟蕭條，人員失業，設備投閒置散，是一個合則兩利的計畫。中國富源的開發，一方面可以供應世界工業原料，一方面可以供爲世界貿易市場。讀者詳讀孫中山先生實業計畫內容，便可窺悉其濟世民族主義思想之宏偉。尤其這種濟世思想貫串在孫中山先生著述思想之中，垂手可擲。

## 柒、結語

手撰本「三民主義」中，曾解說：「民族主義之範圍，有以血統宗教爲歸者，有以歷史習尚爲歸者，語言文字爲歸者，承乎遠矣；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義範圍，則以意志爲歸者也。」意志者，意識是也。民族主義是以民族意識爲歸者也。

孫中山先生所持之主義，如其自述，「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獨見而創獲者。」所以民族主義之精義，其目的，簡要言之，第一是救中國的民族主義；第二是救世界的民族主義；第三是和平、自由、平等、博愛的民族主義。

第一、救中國的民族主義，主張恢復中國固有文化，固有智識，固有倫理，喚醒民族精神，恢復民族地

位，中國境內各民族自求解放，一律平等。從文化、倫理、政治、經濟各方面復興起來。造成一個強盛的中華民族。

第二、救世界的民族主義，主張中國強盛以後，要以自己受列強壓迫的痛苦經驗，幫助弱小民族解脫桎梏，濟弱扶傾，不要學列強的樣，去侵略別國。因此，在中國自求解放的時候，反對講世界主義，等到中國強盛以後，才講世界主義。但是中國所講的世界主義以王道文化為基礎，不會變相成為帝國主義。

中國受到列強經濟力的壓迫，所以民族主義講求經濟的復興，解除列強經濟力的壓迫，消極的方法是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收回關稅自主權；積極的方法則是借用外國資金和人才，開發中國實業，其原則是基於合作互利，而主權必操之在我，開發實業之經營有四大原則：其一必選最利之途，以吸外資；其二必應國民之所最需要；其三必期抵抗之至少；其四必擇地位之適宜。中國開發實業的成果，成為世界共享。「世界禍根可以永遠消滅，而世界人類生活之需要亦可得一絕大之供給資源。」中國天然富源「如能相當開發，則可成為世界中無盡藏之市場。」

中國亦受到列強政治力的壓迫。尤其政治力的壓迫，只要一紙條約，便可以輕易亡國，所以要「救國保種」，政治的民族主義十分重要。而且要以政治革命來保全民族革命的成果。孫中山先生提出民權主義，其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決定者，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換言之，必行民主共和，所以稱之謂國民革命，不同於前朝的其他革命。其積極的辦法就是獨創五權憲法。融貫中西政治思想與制度，創立五權憲法，作為世界新憲政制度的新榜樣。關於五權憲法，學者闡述甚夥，作者深究五權憲法之學理精神，與三權憲法比較研究，獨創以「五權分治」替代「五權分立」，以「二權分立」替代「權能區分」，用以闡釋「五權憲法」不同於「三權憲法」，以糾正國人常誤以「三權憲法」理論闡述「五權憲法」，而生扞格齟齬。

中國固有倫理道德是恢復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法寶。固有倫理思想中的「四維」「八德」以及禮運大同篇與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思想，是提倡民族主義必備的條件，

是恢復民族主義的基礎。

孫中山先生愛己、愛人、愛民族、愛國家，而至愛世界人類。主張發揚王道文化。中國積弱不振，所以期望日本以亞洲之強國，能夠和亞洲之大國——中國互助合作，發揮大亞洲主義，作爲由中國民族主義擴展到世界主義的起點。孫中山先生要求日本國民慎擇「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可惜日本軍國主義者選擇做西方霸道的鷹犬，中國遭受戰火荼毒，日本自己也幾乎遭到亡國滅種，人類最大的不幸。

孫中山先生著述思想之中，散見由救中國到救世界的思想，不論談論任何政策、制度、思想，都是以救中國爲立足點，爲起點，進而達到世界人類和平幸福。其思想之宏偉，世所罕見，著述思想之睿智，近代哲儒革命家所不見。

革命先進邵元冲氏問於孫中山先生曰：「先生平日所治甚博，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法律諸籍，皆篤嗜無倦，畢竟以何者爲專攻？」孫中山先生答曰：「余無所謂專也。」再問曰：「然則先生所治者，究爲何種學問耶？」孫中山先生告曰：「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余革命之智識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爲革命之原料，而組成余之革命學也。」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之目的，即欲實行三民主義也。」自述「我們所主張底革命，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革命。」（註五四）三民主義則以民族主義爲核心，爲起點，爲最終目標，「救國保種」，而「治國」「平天下」。所以敘述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思想時，必涉及文化的、倫理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族主義，甚至孫中山先生的世界觀，都包羅容納在內。

## 註 釋

註 一：民族主義第五講，「國父全集」，黨史會編印，第一冊，第四四頁。

註 二：中國革命史，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一八一頁。

註 三：Carlton J. H. Hay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New York, Richard R. Smith,

1931 轉引自「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台北帕米爾書店，六十六年六月初版，第一八頁。

註四：同註三引書，第一六頁。

註五：同註三引書，第二七頁。

註六：自傳，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一頁。

註七：中國革命史，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一八一頁。

註八：民族主義第五講，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四五頁。

註九：同前註，第五三頁。

註一〇：民族主義第六講，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四五頁。

註一一：錢穆，中華民族之成長與發展，見民族與文化，台北三民書局，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台初版，第一四頁。

註一二：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五九三頁—五九四頁。

註一三：同前註，第五九八頁。

註一四：中國革命史，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一八五頁。

註一五：國與已身的關係如身體之於髮膚，同註一引書，補編，第一二二頁。

註一六：三民主義的本質，見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集，黨史會編印，卷三。

註一七：民族主義第六講，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五四頁。

註一八：同前註。

註一九：同前註。

註二〇：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二一〇頁。

註二一：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二五九頁。

註二二：同前註。

註二三：同前註。

註二四：民生主義第四講，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二一八頁。

註二五：民族主義第五講，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四八頁。

註二六：咨國會非常會議諮詢外交方針文，同註一引書，第四冊，第二七二頁。

註二七：和議重停復湖南林支字 奮勉救國函，同註一引書，第三冊，第六二二頁。

註二八：中國存亡問題，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一四七頁。

註二九：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七八一頁。

註三〇：國民黨宣言，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七九二頁。

註三一：民權主義第四講，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一一八頁。

註三二：復王正廷論外交與內政函，同註一引書，第三冊，第八七一頁。

註三三：致王文華盼聯合黔滇川各省擁戴軍政府並促唐繼堯就元帥電，第三冊，第五一三頁。

註三四：胡漢民，三民主義連環性，見革命先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第一集，黨史會編印，第三四三頁

以後。

註三五：民族主義第二講，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二二頁。

註三六：臨時大總統告友邦書，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七八六頁。

註三七：利用外資以振興中國工商業，同註一引書，補篇，第一二三頁。

- 註三八：興發實業爲救貧之藥劑，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二三五頁。
- 註三九：實業計畫，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五一四頁。
- 註四〇：同前註，第五一七頁。
- 註四一：同前註，第五〇九頁。
- 註四二：築路與建債，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二四二頁。
- 註四三：救中國之貧弱必自擴充鐵路始，同前註，第二四七頁。
- 註四四：實業計畫，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五一七頁。
- 註四五：民族主義第四講，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四三頁。
- 註四六：中國人之天職在促進世界和平，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二一三頁。
- 註四七：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二五八頁。
- 註四八：大亞洲主義，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七六三頁。
- 註四九：中日須互相提攜，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三二五頁。
- 註五〇：戴傳賢，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同註三四引書，第一集，第九二頁。
- 註五一：胡漢民，三民主義與世界革命，同註三四引書，第一集，第三八四頁。
- 註五二：民權主義第五講，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一二五頁。
- 註五三：民生主義第一講，同註一引書，第一冊，第一六九頁。
- 註五四：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同註一引書，第二冊，第四〇三頁。